胶东抗战第一枪

林一山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一支由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会领导，刚起义不久的抗日游击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开始急行军，朝烟台市东南三十公里的牟平城进发。我们这支部队诞生不满一个月，就从威海卫以南六十公里的大水泊，冒雪西上，以控制胶东的战略中心地带。部队到达昆嵛山前的崔家口时，从牟平城内来的情报说：伪警察的下层，对国民党县长和公安局长的投敌十分不满，想反正过来，参加抗日部队。针对这一新的情况，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和大家研究，决定趁伪军内部矛盾和下层士兵的动摇之机，向敌人进行奇袭。

兵贵神速。部队披着星月连夜行军。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以抗日大旗为先导，人人精神振奋。人们抱着坚定的信念，怀着对敌伪暴行的无限仇恨，踏着深深积雪，走了将近一百里路。第二天拂晓前，到达敌占据点牟平城外。部队集中在城南五里的小岗背后，理琪同志和大家一起，观察地形，研究攻城路线。理琪同志和大家采纳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任临时参谋长。接着，我们拟定一个不太内行的作战计划。决定先派一个便衣，摸到城门，活捉守门的伪军，控制城门以后，再行攻城。可是，这位便衣同志，只有一支“哑巴”手枪。在战斗马上就要打响的紧急关头，活捉伪军，抢占城门，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没有枪是不行的。我便把自己的手枪调换给那位便衣同志，让他去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天已拂晓，以坚固著称的牟平城，已经可以隐约地看清它的轮廓了。当我们估计先头部队，已经攻到城门或已经进了城的时候，一声令下，这支人民的抗日部队，就象尖刀一样，一直插向城关。说也奇怪，驻在东关的伪商团，好象事先就发觉了什么似的，当部队距城还很远的时候，黑压压的伪商团队伍的前半截已插进东门了。敌情的变化，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它并没有动摇我们攻城的决心。相反，大家冲得更猛了。人们跑得满身流汗。为了轻装前进，有的战士一面跑，一面甩掉了身上的大衣和棉袄。理琪同志和我，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等同志，带领主力，很快由南门攻入牟平城。另有少数同志，由东门攻入。从城外至城内，喊杀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在我强大攻势的压力下，敌人没有来得及作任何挣扎，就作了瓮中之鳖。于是，我们胜利地攻占了县城。

当我们攻进商团驻地时，楼上楼下，簇拥着伪军士兵，赤手空拳，束手待擒。我的那支“哑巴”枪，和其他同志的好枪一样，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不许动！”“举起手来！”“把枪交出来！”随着我们的命令，伪军乖乖地领我们把藏起来的枪全部取出来了。

接着，我们立即攻击伪县政府。部队正在运动中，忽然

间，从伪县府西院跑出一个伪警士来，他本是出来准备投降的，但因为没有举手，被我身旁的李启明，朝着腿部就开了一枪。这个警士，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叫喊“我不能抗日了！我不能抗日了！”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伤在哪里。他说：“不用看了，完了！完了！”其实，他身上一滴血都没流，只不过裤裆的棉花被打烂了。我说：“朋友，你没有完，连半点血都没有出。”他站起来，摸摸裤裆，连说：“我能抗日了，我能抗日了！我领着你们，捉汉奸县长去！”

这次奇袭牟平城，速战速决，旗开得胜。缴获了一百多条枪，逮捕了两个伪县长和两个伪公安局长，还有一个伪商会的副会长。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一个县里会有两个县长和两个公安局长？原来是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同其他许多县的国民党同僚一样，在敌人到来前，他们坚决打击抗日武装，在日军到来后，就勾结敌人或直接投敌，将政权交给汉奸县长和伪公安局长了。这时，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正在汉奸县长和伪公安局长的家里等差事。国民党的县长被俘后，脸上没有丝毫的愧色，看来只是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神情上才有点恐惧。他一见我就大声喊：“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你们太了不得啦！”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想在我们面前讨好。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有些两样，似乎有点“感动”，表示以后要立志抗日。

二

战斗结束了，攻城战斗获得全胜。根据游击队“袭击胜

利远退却”的战术原则，部队应该立即撤出牟平城，重新部署。可战士们还在忙着搜捕残敌、散发传单、折断旗杆、撕破汉奸旗，部队一时难以集合齐，所以，只好带着集合起来的一部分战士，离开了牟平城。由于领导意见不一致，瞻前顾后，部队走走停停，最后来到一座离城不远的孤庙——雷神庙，商量下步行动计划。

在这里，理琪司令员召集大队领导同志开会。针对留守问题，会议上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恋恋不舍牟平城，主张就地建立抗日政权；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也有人主张找一个既不远离城关，又能背靠山区的比较稳妥的地方打游击。第三种主张，算个折中的方案，似乎比较有利，取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会上，通过了一项立即甩开敌人的决定。可是，这个决定刚刚作出，雷神庙就被日军包围了。

原来，我们还在激烈争论着行动计划的时候，远处的天空已经有敌人的飞机在盘旋低飞。当时，大家预感到在这里久待有危险，可到哪里去呢？一时还没定下去向。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那是敌人侦察我们活动的飞机。如果隐蔽得好，是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才知道，飞机来回盘旋，是在掩护地面上的敌人军用车队前进。而我们开始布置在烟、牟公路上，由阎世印队长和刘中华指导员率领的一支阻击部队，因为缺乏作战经验，见了敌人的飞机就惊慌起来，没有坚守岗位，未放一枪就撤走了。布置在司令部周围的岗哨，事先虽然交待过：发现敌情，就鸣枪报警，但站岗的发现敌人后，一枪没发就隐蔽起来。更成问题的是，住在雷神庙附近半公里、直接负责警卫司令部的主力

部队，没有得到任何命令，擅自押着俘虏撤退了。

被包围的司令部只有二十来个人。除了理琪和我以外，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特务队长杜梓林以及张玉华、姜克等同志。另有三个女同志，两三个神枪手，十几个新入伍的战士。大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还在继续争论着撤退还是驻守的问题时，老乡招呼我们吃饭了。那天是阴历正月十四，农民把准备正月十五吃的东西，送给我们吃。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农民惊慌地向后一退，大呼："哎呀！鬼子！"我向外一看，大门外两边站着几个留小胡子的日本人，他们头戴钢盔，手提镶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迎门还放着一挺机关枪。大家一看，马上向庙的四边分散开。这时，敌人开枪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开始了！

三

敌人用机枪封锁着庙的大门。四合院的四幢庙房，无法互相联络。谁想通过大院，就要遭到敌人的袭击。为了指挥战斗，我手拿驳巴手枪，突然出现在离敌人三、四公尺远的地方，把敌人吓了一跳。当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转身就跑进屋里。理琪同志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倒在庙的庭院当中。在生命的垂危时刻，他还再三嘱咐大家节省子弹，坚持到底。我们分别把守各幢庙房，沉着地向企图冲进庙院的敌人瞄准、射击。我对面有一个敌人，刚从庙外伸进一条腿来，立刻被一位射手击中。敌我相距只有十公尺，敌人伺机向我反扑，而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向敌人射击。激战中，杜梓林同志的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短兵相接的战斗继续着。不少同志受了伤，但每个人只要有一口气，就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我身上虽然已经受了三处伤，衣服也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但自己并没有发觉。直到血已经从身上流到了鞋里，走路时，鞋里的血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敌人几次冲不进来，恼羞成怒，以密集的火力发起了总攻。四面的屋顶曾一度被敌人占领过，但在我们坚决有力地反击中，敌人被打下去了。在我对面的屋顶上，整齐地冒出了十几个敌人的脑袋，一齐向我们射击。我马上指挥已被子弹打穿了肺部的神枪手——胡老头，向敌人射击。胡老头年约四十多岁，当兵二十多年，射击准确，百发百中。虽然敌人利用屋脊和钢盔的掩护，但只要在钢盔下沿露出两只眼睛，胡老头的子弹就会正好射在敌人钢盔的下沿，发发命中。剩下的敌人，一看生命难保，都溜下去了。宋澄同志在另一间屋里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回第二线。这时，我爬上墙头一看，敌人在庙的周围布置了好几道防线，而且都筑有临时掩体。我心想，白天突围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坚决抵抗到黄昏以后，才能设法冲出雷神庙。

敌人又攻上来了，我们再退守到各幢屋里，继续抵抗。这时，有的同志认为被困在庙里被动挨打，不如拼命突围，跟敌人血战到底。我拿出怀表看了看，说："快到四点钟了，只要我们坚持打到夜晚，就一定能够胜利突围；如果白天盲目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势必全部牺牲。"

天将黑，敌人更加疯狂了。在我背后有一个关着的窗户，一下子穿进了十几把刺刀。我见敌人想打开窗子冲进来，立即组织几个同志打了一排子枪，敌人不敢再在窗外活

动了。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敌人放火了，熊熊的烈火很地烧着了我对面和南面的两幢房子，大火越烧越旺。这时候，敌人也不敢冒着火焰向里面冲了。熊熊的烈火，倒成了我们的一道防线。

黄昏，枪声逐渐稀疏了。敌人只是用机枪胡乱地向室内扫射。虽然带光的子弹嗖嗖地飞来，但在苍茫的暮色掩护下，我们都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我麻痹大意，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门框外面，所以被敌人打了一枪，接着，我觉得全身松软，背靠着墙，歪坐倒在地上。我昏迷过去了。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射击已经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敌人撤退了吗？”我这样想着，手按着地，刚要爬起来，不料满手沾着鲜血。我看着遍地的血迹，不由得想起了躺在血泊中的理琪同志，还有那些和我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我愤怒地咬着嘴唇，心里说：“我们的血，是一定不能白流的！”

四

夜幕拉开以后，天又下起了大雪。这时，敌人开始把队伍往回收缩。晚上九点钟，远方忽然传来枪声。大家一齐呼喊起来：“同志们！援军来到了！同志们，冲啊！”听到同志们的呼喊声，我不知那来的一股劲，从血泊中爬起来，同大家一起越过打塌了的垣墙，跳到庙外去了。突围中，我觉得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心想，既然已经打断，干脆扯掉算了。谁想扯了几下，怎么也扯不掉。后来才知道，右手腕

只打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不可能撕掉的。胜利突围以后，我一直跑了两公里，才逐渐觉得身体疲惫不堪。这时，十七岁的女同志夏来把我背走了。当夜由黄在同志组成了接力担架队，跑步向后方护送我们。他们在七架敌机的侦察威胁下，护送我们四、五个伤员，一天跑了五十多里路，那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啊！当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员都分散隐蔽；飞机掠过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一直把伤员抬到了我的家。

自一九三七年年底，敌人用七十多辆汽车，从青岛到烟台进行武装示威以来，群众中不少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牟平袭击战和雷神庙战斗的胜利，把那些悲观空气一扫而光，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斗志。记得我们攻克牟平城以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互相祝贺，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这一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胶东。

雷神庙战斗结束后，留在后方的吕其恩等同志，当听到理琪同志和杜梓林同志牺牲的不幸消息时，都失声哭了起来。是的，战争使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但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投入新的战斗，去争取新的胜利！理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战中一系列胜利的起点。它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坚定了抗战的必胜信心。

事后，三军司令部赏罚分明，处分了不执行原定军事计划而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的干部，表扬了坚决服从命令的指战员。这一决定，更加提高了三军一大队的战斗力。

敌人在雷神庙吃了败仗，垂头丧气地溜回烟台据点，再

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飞机作掩护，对附近县城进行骚扰。以后，在我胶东人民抗日的高潮中，在我们军队继续西上的威胁下，敌人只得龟缩到青岛、烟台、威海卫三个沿海据点和胶济铁路沿线。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从此，胶东军民乘胜前进，抗日部队，在几个月内扩大了数十倍。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高潮中，虽然也有一些部队，或真或假的也打起了抗战的旗帜，但是，假的乱不了真，真正抗战的红旗在胶东大地到处飘扬起来了。

注：此文原载《胶东风云录》。我们在转载时，对个别字句略有删改。

——编　者

鲁东抗日联军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我胶东八路军为了一致对敌，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与国民党在胶东的二十多个游击“司令”曾经议定组成“胶东抗日联军”。赵保原任总指挥，八路军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任副总指挥。后因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分裂，不久联军即遭解体。

（文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1944年东海区的秋季攻势

张少虹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在东海区的据点开始逐步撤守，龟缩在沿海和中心城镇中。在这种形势下我东海军分区展开了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秋季攻势。

（一）

根据胶东军区首长的命令，东海区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拔除敌伪军深入在东海区腹地的水道据点。当时拟定的作战方案是：由司令员刘涌同志，政委仲曦东同志和副司令员于得水同志率直属三个营配合军区十六团的三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而叫我在“家”看门。但我反复想，既然可组织一个攻势，仅仅在水道这一点上开展，是否显得太单薄一些，能否把打击面再扩大一些呢？同时，又是青纱帐季节，是敌守我攻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可是，主力都带走了，再欲组织一个象样的攻势，力量就显得不足。怎么办呢？我既要服从整体部署，保证主要战场的胜利，又不甘心守备看家，坐失战机。

常言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考虑了一个“以攻为守”的战术。于是，向刘、仲同志建议：再把文东、文西，荣成、威海四个独立营集中起来，以文登城为目标，把

它围困起来，一不使敌人增援水道据点，二还可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我也不多要机关人员，只要一个老郝（敌工股副股长郝香斋同志）、一个干事、一个秘书和几个便衣就够了。经过刘、仲二同志商量，认为可行，就慨然应允了，并立即给四个县的独立营下达了命令。就这样，我们一行八、九人，和刘、仲他们兵分两路，实行东、西两线作战。

（二）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到达了文东独立营驻地泊石村。这时四个独立营已到达了指定的地点。晚饭后，我们在文东独立营驻地泊石村，召开了各独立营首长会议，制订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有：荣成独立营营长周文茂，副政委慕北场；文东独立营营长刘剑秋，副政委刘进；威海独立营营长江海，副政委宋奇光；文西独立营营长贾邦元，副政委刘江。在了解、分析和研究了敌情之后，当即决定：

第一，文东和荣成（缺一个连）两个独立营，还有靠城附近的各区中队和民兵，负责围困文登城，并随时准备出击出入城的敌伪军。

文登城分老城和新城，原来的旧城为老城，驻着五个伪军中队和一个省伪警备大队（三个中队），共有伪军八百余人，还有伪警察、伪县政府二百多人。在老城东南约五百米处，日军把原毕庶澄的官宅子和省立文登第七乡村师范学校，单独修了围墙、碉堡，挖了壕沟，叫做新城。驻日军一个中队、一个宪兵小队、一个机炮小队、一个便衣班共二百多人。文登城附近东面峰山，南面三里庙，西面七里汤、阎家庄，北面二龙山等敌据点，分别驻有伪军一个小队。

第二，威海独立营负责卡住文（登）威（海）公路。以伏击、麻雀、地雷战，打击往来文、威的日、伪军。同时威海独立营还有组织指挥区中队和民兵，把公路上的杨家产、高格庄、申格庄的据点（分别驻伪军一个小队）包围起来，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一面切断敌人同城里的联系，并监视草庙子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敌人的行动。

第三，文西独立营负责围困文（登）烟（台）公路上的汪疃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迫使伪军投降。

第四，由郝香斋同志领导于云海同志和一个月前被我军俘虏的原文城伪军副大队长杨子实，负责掌握敌伪的内部情况。并和我在伪军的内线取得联系，以备里应外合，消灭老城的全部伪军，或争取伪军反正。

作战计划下达后，各独立营都按指定地点，分别集结在文登城周围，实行围困、监视、堵截文登城敌人。

大约在零点的时候，我刚刚入睡，郝香斋同志把我叫醒，说刚才赛有勇同志派联络员送来一份情报，明天清早有五十多个鬼子要到威海去，企图不详。

根据这个情报，我们决定抓住战机，伏击敌人。因为威海独立营在两小时前，已经出发到城东北的洪水岚村，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由文东独立营派两个熟悉道路的通信员火速送给他们，要他们拂晓前在公路上设伏。不幸那两个通信员中途踏响了民兵埋设的地雷，结果一伤一亡，以致失掉了设伏的战机。

后来我们又从伪军家属的口中得知，城里的日伪军见我军云集在城周围，有攻城的架势，恐慌不安，寝食不宁。加上前几天伪军大队部日本指导官曾对伪军官们说，不日将把

一、二、三、八中队改编为“皇协军”调往他处，这更使伪军官兵及其家属慌乱动摇起来，各人都在暗中作着自己的打算。伪二中队长刘振海，八中队长孙世忠和伪二区长邵玉堂等，都找关系传出话来，说他们一定要拉出来，弃暗投明。但是，他们中有的又在观察形势，看风使舵。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除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随时准备出击外，还派人进城对伪军进行威胁、瓦解和劝降，同时不断向日伪军散发宣传品和加强夜间喊话，致使日伪军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三）

八月二十三日晨，伪二区长邵玉堂率领四个人投诚我军。我文西六中队第二班，在完成对七里汤据点伪军的迫退任务之后，出敌不意最先从城西门攻入老城，给伪军以有力地袭击后撤出。

八月二十五日晚大约八点左右，赛有勇同志又从日军那里获悉：日军六十余人，伪军二百余人，带着轻重机枪，二十六日早晨要去威海。于是，我即令集结在洪水岚一带的威海独立营，在杨家产至申格庄这段公路上，选择有利地形设伏。但考虑到，威海独立营三个连伏击这么多敌人有困难。同时又调文东独立营二连参加这次伏击。因二连连长赛时礼同志是个作战能手，但他又是个负过伤的瘸子，急行军有困难，再加上天已到了半夜，他们必须在两小时之内，从泊石村行军三十多华里于拂晓前赶到城东北公路上。于是，我就让他骑上我的马，由营长刘剑秋同志率领，抢在敌人前头，同威海独立营合兵一处，完成这一任务。

天亮了，我带着有关同志上了泊石北山。望远镜里，文登城笼罩在浓雾和炊烟之中，只能看出几个高大的碉堡，整个文城死气沉沉。从峰山、三里庙子据点里，偶尔传出几声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显然是伪军在打枪壮胆。

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文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从手榴弹的激烈爆炸声中，可以断定敌人是中了我军的埋伏。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手榴弹就不响了，只有零星的枪声，可以肯定战斗结束了。

中午，我正在吃饭，接到威独和文（东）独送来的战斗报告，大意是：早晨六点时，日军在前，伪军在后进入了伏击圈，因为日伪军拉的距离太长，由文独二连负责顶住了伪军，威独集中力量打击日军，战斗一开始就跟敌人拼了手榴弹，威独一、二连冲进了慌乱的敌群，跟敌人拼了刺刀，打得敌人抱头乱窜，逃进了杨家产据点，二百多伪军被文独二连打得顾不得解日军之围，也逃进了据点。在日军慌乱逃跑时，威独截歼日军一个班（共十二人），打死打伤日伪军二十多个，缴获歪把轻机枪一挺，大盖枪六支，子弹二千余发，钢盔二十多个；日军丢下两具尸体，被我收容，用白布包了起来，着老百姓抬着送进了文登城里。文（东）独二连俘虏伪军六名，得步枪六支，子弹五百余发，钢盔八个。威独有一名同志牺牲，两名同志负伤。

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到公路东南的洪水岚村，隐蔽起来，观察敌人动向。如敌人回城就把文（东）独二连（因为他们熟悉城北的地形），运动到城后崖子头南山上，这样，不管敌人从大路还是从小路上回城，都能在运动中伏击敌人。

看完了这个报告，我们分析：一旦下午敌人回城，在城下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城里的敌人必闻声倾巢出援，我军将两面受敌，恐二连不支。因时间紧迫，想改变他们的战斗计划已来不及了，故当即决定：命令文东独立营一连，迅速运动到文登营村，以便随时增援城后的二连作战；令荣成独立营集结待命。同时，组织几个区中队和一部分民兵在城外佯动，以牵制城里的敌军。

下午四时半，从城后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果然不出所料，在城北的战斗打响不到二十分钟，城里的日伪军一齐拥出城来，跑到峰山口子两边的山顶上，鸣枪打炮，呐喊助威。但却没敢冲下山去。激战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落山，城北的枪声才停止了。

这一仗二连和威独一连都打得很勇猛，把日伪军打得弃尸而逃。文东二连俘伪军二十五人，得捷克式步枪二十六支，子弹一千余发，打死打伤日伪军二十多人，日军弃尸三具，伪军弃尸十多具。二连也牺牲了五名同志，九名同志负伤。

在这一天当中，敌人连吃两个败仗，必定疲备不堪。我们决定：趁敌人疲备、慌乱之机，夜间摸进老城，利用伪军关系做内应，求得全歼文登城之敌。郝香斋同志组织于云海同志和杨子实，还有几个熟悉道路情况的群众作向导，令荣成独立营和文东独立营白天未参加战斗的连队在二十一时之前到达城南苏家河集结。但由于文东独立营未能按时到达，预料拂晓前难以结束战斗，只好做罢。由于我大军集结苏家河，老百姓都看到了。我军攻城的消息第二天一早就传入城内，使日伪军更加慌乱不堪。同时文城周围的三里庙、

阎家庄、二龙山等据点的守敌，也先后撤到城里。

（四）

八月三十日早晨，威海敌酋吉山，率日军二百多人，乘八辆大卡车到了草庙子据点。因为怕途中遇伏，由草庙子步行进入文登新城。我们估计吉山此来，有把文登城的日伪军全部拉往威海的可能，故当即做了以下部署：

（一）威海独立营立即到杨家产至申格庄这段公路上设伏，小伏击不成，就进行沿路侧击。

（二）文东独立营跑步从城东占领城北崖子头南山。这样敌人不管从公路或从小路逃跑，都能阻击和侧击敌人。

（三）我率荣成独立营，从城西北赶到敌人前头切断敌人退路，和文东独立营一起夹击敌人。

当荣成独立营赶到柳林村东头的时候，已是午饭之后。听到从城里跑出的四个老乡说：从上午开始，城里的伪军就胡乱打枪，还闯进老百姓的家里抢东西；新城的日本鬼子都集结在大操场上。我们马上令荣独派出一个班迅速爬上后寺北山，用机枪狠扫集结在操场上的日军。枪声一响，集结在操场上的日寇即刻乱成一团，一部分嚎叫着抢占后寺北山，掩护日伪大部队逃窜。后寺北山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公路修在驴脊梁骨上，这对荣成独立营从西边出击极为不利。而敌人居高临下，用一部分兵力阻止我对其左翼的攻击，大部队无心恋战，只是把全部伪军和骡驮子，还有挑弹药的老百姓夹在中间，不顾一切地向北逃窜。趁敌右翼还未打响，文东独立营迅速向敌右翼攻击。但由于他们急于打扫文城的战场，只派了一个班的兵力跟敌人的后尾部队打了一阵，就又

回到城里。这样就减轻了敌人右翼的压力。在左翼，日军和荣独展开了拉锯战，终因敌人退却心切，加之地形不利于我，未能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

战斗中我们的指挥所被敌人发现了，遭到敌人机枪的集中扫射。我和一位侦察员负了伤，当时同志们见我血流满面，就忙于抢救，其实我的伤并不重，还可以继续组织攻势作战。

这次追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十多个，截下三个骡驮子，还有被敌人捉去挑东西的三十多个老百姓。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扔在公路上，敌人只把每个尸体上的胳膊砍去一只带走了。伪四中队的一个小队和伪一、三区队近百人，趁敌人慌乱逃窜之际，投降了我军。还有我情报关系赛有勇同志率便衣班的十多人跑了回来。

荣成和文东独立营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十一名同志，有四十名同志负伤。

文登城解放后，我们布置开展新区的工作，委派于云海同志暂代理文城镇镇长。又派杨子实和赛有勇同志连夜去汪疃据点，进行劝降工作。

汪疃是文（登）烟（台）公路上最大的据点，驻着一个伪军中队，中队长叫刘占山，是个狡猾的兵痞。在十天前文西独立营就包围了这个据点，几次劝他投降，他都不肯，说什么“八路军打不下文登城，让我怎么投降呢”。当他知道文登城已经解放时，又说什么“这投降二字怎能叫我说出口来呢”，要求再给他五天考虑时间。其实他是想固守待援，但在我军团团围困下，又不见援军到来，他怕落个“拒不投降死路一条”的下场，所以在第三天的上午他就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